

新民歌运动衰落原因之探讨

潜鹏州

【摘要】大跃进时期，文艺界“大跃进”的突出代表就是新民歌运动。但是，新民歌运动时间短暂，仅仅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就迅速衰落。笔者认为形势的转变、创作群体低下的文学素养等缺陷是其迅速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大跃进 新民歌运动 衰落原因

1958年，狂飙突进的大跃进运动爆发。与工农业争相“放卫星”齐头并进的，是文艺战线上出现的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对新民歌运动产生影响。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本文试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作者层次两个方面来探讨新民歌运动迅速衰落的原因。

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1957年冬季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兴修水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新面貌的民歌。在这次热潮中，众多地方出于动员群众的目的，创作了诸如“沟不通，不放松；水不到田，不回家过年”、“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一类的口号。经萧三的推动，这些口号登上《人民日报》，并将其评论为是“最好的诗”。此即新民歌运动的雏形。

（一）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转变

新民歌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有直接关系，他希望通过一场狂飙激进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文化。“一直主张‘文学为工农服务’的诗人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宝贵力量，寄希望于下层民间力量繁荣社会主义文艺”，^[1]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要求与会人员“搞点民歌”，要求他们去“搜集点民歌……搞几个点试办，……写写民歌。”随后的汉口会议中，毛泽东更是要求各省、全国大中小学生、军队广泛参与创作民歌。

毛泽东指出：“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2]毛泽东的构想反映了当时整整一代中国人面对残破的家园，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甚至比其他人看得更远。在他眼里，新民歌运动还是实现他对新中国文化理想的实验。但是他不信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寄希望于新民歌运动，试图通过民歌建构无产阶级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此，“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并不是真正的民间文艺运动，毋宁说它是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性群众活动与国家政府行为。”^[3]所以，新民歌运动一开始就打上政治烙印，它不再是单纯的民间自发的民歌创作运动，而是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的从文化上改造中国落后状况，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次政治运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新民歌运得以迅速发展。但毛泽东发现新民歌运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的热情逐渐消退。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

巢湖怎么端得起来？”^[4]三个月后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批判道：“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5]毛泽东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成为新民歌运动致命的弱点，也是它飞速陨落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新民歌运动迅速衰落。

（二）政治形势的变化

1958年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弊端开始集中浮现。大跃进中的全民大炼钢运动，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超越经济条件、违背经济规律的盲目跃进，收获的只能是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失衡和倒退；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颠覆，人祸的蔓延和饿殍遍野。”^[6]当人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自然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去创作和收集新民歌。

经济恶化直接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变化。面对着被严重破坏国名经济，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初衷，着手纠正“左”倾错误。狂热的、试图建立“诗化社会”的新民歌运动亦在纠正的范畴，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左”的思潮被全面遏制，这成为压垮新民歌运动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创作群体文学素养不高

毛泽东发出的关于“收集民歌”的号召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各级党委闻风而动，迅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民歌收集活动。短短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云南已经收集到近万首民歌的报道。云南人民出版社已在编印三本民歌集。各省、市，乃至县党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把创作民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于是人们普遍产生一种民歌越多越光荣的心态，去疯狂地编写，不顾质量，只管数量。如湖北省要求书记带头，全党动手参与，动员全体宣传文教工作者和基层干部，民间艺人以及所有的知识分子，动员一切力量，深入到群众中进行采风活动，要求做到“有风必采，随采随报，月月汇集，月月编选，能出书的出书，该上报的上报”。同时还认为采风写歌作为政治任务，要求把它制度化起来。此时编写民歌的，主要有普通群众、文艺界诗人、民间诗人三个群体

（一）普通群众

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各级党委采用将任务层层下派的方式，并专门制定写作指标，如南京市要在50天内创作130万余首民歌，这要求每个人都要写诗。不管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还是已经是年已花甲的老人，“人人都是诗人”，就连已经沦为“敌人”的“右派分子”也不放过。

作家聂绀弩在著作《散宜生·自序》中，详细地描述了上级命令传达至农场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子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7]于是人们将新民歌写作指标看作是经济指标一样，去忙于完成。民歌写作不仅失去了全面的自由性，更失去了在口头传承中生成与积淀的时间和空间，民歌不再是“口由心声”的自由抒情，而成了即时应景的、虚假的粗制滥造。

（二）文艺界诗人

民歌收集的浪潮也蔓延到文艺界，正如郭沫若所言：“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对新民歌运动的态度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成为分辨文艺界人士阶级立场、阶级道路的标准。郭沫若明确指出：“谁在踌躇不肯收集，那就表明他走的道路有问题。可能他也有些‘道理’，但那是另外一条道路上的‘道理’——‘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8]4月26日，在周扬的主持下，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座谈会。会后，正式向全国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的号召。

迫于政治压力，文艺界诗人开始创作“民歌体新诗”。如因《雾中汉水》而受到批判的诗人蔡其矫，他1958年的作品《水利建设山歌十首》：“改了洋腔唱土调，改了新诗唱山歌，唱起山歌长干劲，一人歌唱大家和。”^[9]诗是情感的表达，文艺界诗人虽大量撰写民歌，但这些民歌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政治立场，无疑是粗制滥造，与他们精心创作的诗歌相比，显得尤为低劣。

（三）民间诗人

在政治任务和创作指标的共同作用下，涌现出了大批的民间诗人。他们是新民歌运动创作的主体，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专业诗人。据学者谢保杰研究统计，当时比较突出的民间诗人有：王老九、黄声孝、殷光兰、霍满生、李根宝等，最著名者当属王老九。王老九曾上过私塾，早年曾创作快板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改而创作民歌，歌颂党，歌颂最高领袖，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被称为“农民诗人”。王老九最著名的作品即《歌颂毛主席》：“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种地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知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红光照屋里。开会呼唤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水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

拖拉机”^[10]。诚然，这一首民歌十分质朴，但缺乏美学意义。学者赵金钟在其论著《“大跃进”新民歌现象评说》中认为，这是一种把幻想当成现实，把豪言壮语当英雄气概，把脱离实际的空喊当成浪漫主义的倾向。它严重地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把诗歌当成了左倾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值得进一步省视的。

当时有“社社要有王老九”的口号，可见大多数民歌的创作者水平尚不及王老九，正如吴雁所言：“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以为，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了作家……并创作才能，对于作家来说，便是基础之一。完全脱离开自己的基础，那种敢想敢干实际上是吹牛，值不得拍手叫好……（民间诗人）既不懂创作劳动的艰辛，也不了解才能的意义，脑子里只有一块招牌，拆穿来，名利二字而已！”^[11]

新民歌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受创作群体自身文学素养的局限，都难以产生足够文学艺术价值，很难满足毛泽东建立“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需求，也就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所放弃，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 [1] 赫牧襄.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 [3] 王晓生. 激情癫狂: 1958年新民歌的理论话题[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5] 陈晋. 文人毛泽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6] 齐鹏飞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7] 聂绀弩. 聂绀弩诗全编[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2.
- [8] 郭沫若. 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9] 蔡其矫. 水利建设山歌十首[J]. 人民文学, 1958(4).
- [10] 王老九. 想起毛主席(外一首)[J]. 诗刊, 2009(17).
- [11] 谢冕,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作者简介: 潜鹏州, 浙江丽水人,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学科教学(历史)16级研究生在读。